

Eighty Years of Historiography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from "Nanyang Studies" to
Chinese Studies"(1930~2009)

廖文辉
LEW Bon Hoi



马新史学80年

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

(1930~2009)

廖文辉 LEW Bon Hoi

马新史学80年

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

(1930~2009)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新史学 80 年 / 廖文辉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11
ISBN 978 - 7 - 5426 - 3370 - 5

I. ①马… II. ①廖… III. ①华人—历史—研究—马来西亚 ②华人—历史—研究—新加坡 IV. ①D634. 333. 8
②D634. 333.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4495 号

马新史学 80 年

著 者 / 廖文辉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90 千字

印 张 / 11.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3370 - 5/K · 149

定 价 / 32.00 元

为马新史学立言

——序廖文辉《马新史学 80 年》

朱崇科*

长期以来,“南洋”作为中华文化视线余光中所波及的他者(the other),往往只是聊备一格的填充。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进入 20 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其经济、文化层面的承继、赓续和衍生却远非“中华文化无远弗届”的虚荣/自豪框限可以涵纳。即使刨除“礼失求诸野”的边缘/中心规律,从今天文化差异与对话的语境考量,其丰富包含更需文化母体重新加以审视。毋庸讳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华人族群聚居地,不仅仅其自身的性质流变与创造值得中国人关注,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被我们简单化、笼统化的族群内部其实也贯穿着本土认同的潜流和巨澜。

有心人不难发现,在区区 600 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岛国——新加坡——身上其实凝聚着“新加坡学”的丰厚,而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不止闪耀着勇于坚守、开拓创新的光芒,同时也重新诠释着中华文化变异后的吐故纳新与藏龙卧虎。而稍微了解马新文学、教育、政治、文化等状况的人士其实更会明了在这样的“热土”(赤道国家)上,其实生长着五彩缤纷的硕果,而热带雨林深处自有其妙不可言。

* 朱崇科,男,1975 年生于中国山东,2005 年 5 月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并以“百人计划”人才引进方式任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07 年 8 月—2008 年 6 月担任纽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访问教授。著有专著 4 部,单篇论文百余篇。

廖文辉博士的大著《马新史学 80 年——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1930—2009)》从此视角观照下自有其独到之处。而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如果从马新本土视角考察,则其意味更显深长。我们不妨从如下几个层面加以考察:

一、史学史:历时性梳理

熟悉当今马新文化的人士会知晓,在马新华人的关注焦点中,文学、教育、政治等层面位居前列,而史学则相对冷僻。文辉博士此书恰恰是从孤寂处发声,以历时性视角为主轴,戮力梳理相对冷僻的马新史学发展轨迹。一般而言,从人文社科学术的意义上讲,没有资料,几乎没有学术可言;更进一步,从史学研究的要求来看,此论尤其彰显;实际上,还可更进一步,如果我们思考马新文史学术建构的话,资料(一二手)则更是至关重要——因为马新研究的资料离散性似乎和华人的散居特征丝丝勾连。以此来反省中国大陆学界某些有关研究,正是此软肋,使得某些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复存在,从而严谨研究东南亚摇身一变成了漏洞百出的“想象南洋”。

文辉博士为人厚道稳重,分别在台湾大学、马来亚大学、厦门大学完成大学各级教育,其学术的经历使得他既有锐利博学的一面,又能够“板凳可坐十年冷”,扎扎实实钻入故纸堆,耐心记录并反思马新历史学的发展轨迹,这项实践,自有其一石三鸟之功效:既提升了自我,又可承前启后、造福当世,更可方便后人使用相关资料。单纯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马新史学 80 年》立足于各类史料,并尽可能“穷形尽相”,功劳不小,相信无论是对于本土学者,还是国际相关学界都有所裨益。

二、述和评:点面结合与本土关照

文辉此书绝不只是单纯史料的搜寻和堆积,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也在缕述中呈现出史家撰述的主体性,其特点就是点面结合与本土关照。

从宏观层面来看,文辉巧妙地将马新史学分为三个时期:“南洋研究”滥觞期、“南洋研究”发展/高峰期以及“华人研究”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划分不仅提纲挈领,而且也相对清晰地指出了相关研究内在规律的发展动向与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文辉对“南洋研究”滥觞期的界定,不仅仅是时间方面的提前(从1930到1940),而且是将之置于彼时国际学术生产的大环境中加以确认(identify),同时以本土认同演变的强化为主线,指明了马新史学研究中范式更新(paradigm shift)的主要动因。

从微观层面看,文辉对书中所涉及的史学论述不论巨细皆着力加以点评,或蜻蜓点水一语带过,或三言两语,或专章专节细描(如第四章),但不论怎样,相关评述往往可画龙点睛,而专章论述则又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点面结合、妙笔生花,如此一来,对马新史学80年的勾勒既脉络分明,又血肉丰满。

必须强调的是,文辉博士对“马新史学”的论述中不乏对本土的侧重和依赖。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本土关照可分为三重:1. 作为历史书写主体的史学前辈们的本土情怀嬗变;2. 他们所聚焦的马新本土空间、事务/事物以及3. 文辉博士作为本土史家的有意识的本土知识生产。毋庸置疑,马新的文化生产其立场、训练、视野、规范可以国际化,但基本上的观照视野却必须坚守“开放的本土”精神,在相关的文学论述中,我也一再强调此点(具体可参拙著《本土性的纠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及《考古文学“南洋”——新马华文文学与本土性》,上海三联书店,2008)。

三、方法论:“马新史学”(学派)?

相较而言,作为后发性的学术生产,“马新史学”自有其先天的劣势,即使回到本土文化场域(cultural field),相关史学实践亦相对

落寞。在此氛围中，“马新史学”的建构其实富含“危/机”。但“危/机”一词既含困难，又容机遇，这不只是汉字的游戏或障眼法，而是一种有意味的逻辑辩证。

文辉博士在该书中，特别强调要史、论并重，而现阶段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出版却更刻不容缓，我们当然可以理解文辉的苦心婆心。但同时，在不长的篇幅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对方法论的重视。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加强调与深化如下两点：

1. 跨学科。与“南洋研究”的滥觞更多和中国学界以及英文源流学界息息相关类似，“马新史学”其实可以更好地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先发优势，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取长补短，同时，更要注意和本土文学、教育、政治研究等相对成熟的领域互通声气、兼容并蓄，这样可能会把后发的劣势变成迎头赶上的契机。

2. 跨区域。在强调本土的同时，我们应当时刻维持国际化的眼光和胸怀。举凡大中国、欧美学界等地的顶尖高手与新锐思想，无论是史学理论、方法，还是有关东南亚、中国学的研究基础都可成为借镜的工具。易言之，也只有容纳百家之长，才可成就一家大业。从更高的意义上理解，我对“马新史学”的思考除了文辉博士的界定包含之外，还别有期待——将来或许可以建构极具世界影响的“马新史学”学派，好比法国的年鉴学派、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等。从此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顶尖学者——王赓武，当然，也需要更多的民间学者——许云樵。

作为更多侧重文学研究、曾经在马新度过近四年黄金时光的学人，我原本不够格为文辉这本史学大著作序，但我和文辉兄虽分属文史学科，却在研究方法、学术理念、南洋情结等方面有着心神相通之处，为此，当文辉兄来函索序时，我不揣浅陋、欣然从命；同时，我也把这本书纳入业师王润华教授和我主编的“热带雨林论丛”（由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开始陆续出版）中来，大概既是一种充满褒扬的推介，又是一种对我所萦怀的马新的遥遥礼敬。其实，你我都知道，

文辉博士的总结更是未完成的梳理,更可能是“马新史学”更上一层楼的新契机。

朱崇科

2010年3月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个人工作室

序

魏月萍*

1932年1月3日《星洲日报》特别开辟《南洋研究》专栏，一般被视为马新南洋研究的滥觞。当时一名署名“记者”的作者撰写《为什么要研究南洋》，涵括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目的。文中强调要让南洋政治成为新中国建设的借镜；其次，通过研究南洋的经济状况，与欧日学者分庭抗礼；另外，理解南洋的过去与现时状态，可沟通中南文化，促进民族间的和解。南来学人与重要南洋研究学者之一许云樵，也曾多次为文陈述南洋研究的重要意义，如在《怎样研究南洋史地》、《50年来的南洋研究》中，皆把南洋研究视为史学传统，并以史地研究作为南洋研究的代表。

在当时的语境脉络底下，“南洋研究”确实背负着多重的任务，例如反殖、沟通中国与南洋文化，以及后来建立马来亚的历史文化系统等。80年后的今日，当华人研究成为区域研究的重要一环时，为什么我们要研究“南洋研究”呢？重新开启对南洋研究的历史想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 魏月萍(NGOI Guat Peng)，女，马来西亚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撰写《从“离心”到“主体”历史意蕴的建构——独立后马华地方史初探》、《中国与在地：新马两地对南洋研究传统的知识认同》、《“谁”在乎“文学公民权”？马华文学政治身份的论述策略》、《我不在家国——马华文学公民身份建构的可能》、《非“华”不可？族群政治角力下的知识生产》、《评廖文辉、曾维龙纂注〈许云樵书信集〉》、《学术去殖民的开始？评〈绝代英华——马来(亚)英殖民时期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等有关马华历史文化与文学政治身份等文论与书评。

如许多历史研究者所同意,历史学者总是在过去找寻意义和模式。“南洋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或许可以不只限于传统的追溯与学人典范的追求,它所开展的“知识空间”,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历史与文化知识的生产,特别是如何提供一套认识“周边文化”的知识,马来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地,在“南洋”这个空间底下凝聚彼此之间的认同,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当时南洋研究的历史观,以地理空间为标志,提供了一种多元参照的历史与文化系统,而这种“解中心”与“多元交叉”的历史文化观念,似乎在今日重新获得青睐,尤其是在“中心—边缘”模式渐渐失去它的解释力后,不少历史学者试图通过“周边”来反观自我,试图从历史、语言、文化、风俗等,建立想象的文化共同体,例如今日学界尝试以汉字历史渊源形成的“汉字文化圈”或以异质华语为主体的“华语语系”,藉以考究彼此的同与不同,其背后却是以尊重差异与混杂作为最高原则。所以每每读及诸位先辈们南洋研究成果,思及他们对马新周边文化的亲切,相比后来倾向从族群关系探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仿佛遗落了万花筒般的文化视野。

明显的,从“南洋”的“区域”概念到“华人”的“族群”概念,早期南洋研究所突显的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减弱了。这乃是有迹可寻的,尤其在马来亚独立以及马新分家后,马新华人需要对应各别庞大的国家体系,并思及如何在国家位置中确立华人的主体性以及族群身份,那不再是以地理范畴所规定的“南洋”,而是由政治切割出来的族群边界。华人是什么?华人的身份如何认定?华人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如何,华社的建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倏然成为华人研究上迫切需要寻找解答的问题。

不过“南洋研究”与“华人研究”并非是完全割裂或互不相干,当中也不是一个旧传统与新传统的意义,反之,它们是一个演化的连续体,可以互为依存,可又各自独立,倘若把它们视为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与知识生产与建构或更为恰当。知识的建构需要一套生产

的机制,强而有力的研究与知识社群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而这个知识社群的历史与文化观念,以及他们的知识资源,将影响他们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今日我们所理解的“历史知识”。例如著名历史学家卡耳(Edward Hallett Carr)与观念思想史家艾萨克·柏林(Isaiah Berlin),都是通过研究俄国作家与思想家,进而提出历史研究的种种问题,如历史的规律,或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回到“南洋研究”与“南洋研究学人”,如上述所言,如果南洋研究是一种知识形态,经由对二者的理解,我们可以提出什么问题,或解释怎样的问题?如何通过他们的研究对象,找出他们背后所持的知识、历史或文化观念,或可从中把握到“南洋研究”的当代价值,也许不仅限于所谓的南洋知识,而可以深入至学人的知识视野,如何相互配合而形成知识共同圈或链条。

这当然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无法对此书作如此的苛求,毕竟研究有其主观意向,文辉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史学传统这回事,这仍是很重要的议题;文辉对南洋学人的知识系统与资源论述虽有着墨,却较少从生产脉络中考察,实可理解。然我所疑惑的是,南洋研究知识社群的知识特色多元,是否可将他们都划入中国史学统称的乾嘉学派,也许仍有商榷之地。以刘士木为例,他留学日本,受日本历史与社会研究方法的影响,与其说是传统式的“考证”,或许更接近西方的调查研究的“实证”方法。

纵然如此,这本书实提供与整理了许多详尽的材料,同时也打开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南来学人的“南洋视野”,通过对南洋研究学人的传记式记叙,读者可以体会压在南洋研究背后对“南洋世界”的浓郁情感,也为后来发展的华人研究找到一个演变的历史前源。华人研究如何生产与南洋研究者不一样的知识形态,我想是有趣的问题,除了大致说明生产了“什么”,“如何”生产也是未来可以拓展的比较课题。

文辉曾坦言,出版此书之后,将暂且离开南洋研究,转向书写

“国史”，那是更大的一项书写工程，期待他下一本书。是为序。

魏月萍

完稿于 2010 年 5 月

自序

众所周知,东南亚史(前称南洋史)成为一门学科,是相当晚近的事。东南亚史的研究早期主要是由东来殖民的欧美殖民者所进行,马来亚史的研究亦不例外。打从葡人占领马六甲开始,各种各类的官方文书及游记就陆续出现,但对马来亚进行较全面及完整论述与研究的,大概要从英殖民统治开始。1877年,致志于马新史学研究的海峡分会成立,并于次年起刊行学报,年出二册,为马新研究树立了传统。所以英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即已在马新树立了东南亚史研究的传统。而马来民族自《马来纪年》以来,也有其史学传统。那么马新华族以华文作为史学研究的工具,是否可构成一种史学传统呢?在文学领域里,形成了所谓的马华文学,而有马华文学史的研究。但在史学领域里,是否有马新华人史学的存在,进而有所谓的马新华人史学史的研究?本书将透过各种具体的例证和论述尝试回应和解答这个问题。

这本书最早只是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但基本论述架构和雏形已经出现,曾试投报章副刊,但不受理,后来另有想法,觉得这是个可以继续发挥的研究课题,因此决定将之以学术论文的规格来撰述,遂完成两万余言的《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20世纪马新华文源流马新史学发展分期刍论》,并发表于2003年华社研究中心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六期)。以后,在这个基础上陆续发表了十余篇相关的文字。此外,本书也可以视为笔者博士论文部分章节的扩大补充,在这个基础上,增补不多于三分之二的内容。

这议题打从笔者进入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任教开始,就已经在思索,没想越钻越深,转眼已历七寒暑,研究范围从点线扩张成面,有约二十万言的积累,其中 1970 年以前的部分论述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组成部分。现将这些文字略事编辑整理,修饰补遗,同时也将空白或不足处扩大深入论述以付梓。由于文稿属专题研究中的通论著述,前此发表的文章则属专题式研究,在增删过程中,难免有切裂之弊病,如读者诸君欲从专题的角度了解,可以回溯这些单篇文字。为方便查找,故此将之胪列如示:

1. 《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20 世纪马新华文源流马新史学发展分期刍论》,载《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03 年第 6 期,第 71—100 页。

2. 《南大历史系师生对马新史学的贡献》,载李业霖编《南大论文集》(八打灵: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2004),第 195—237 页。

3. 《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载《海华与东南亚研究季刊》,2004 年 1 月第 4 卷第 1 期,第 71—92 页。

4. 《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第 143—161 页。

5. 《从报章期刊杂志的出版及学会团体成立论马新史学的发展方向(1930—2004)和历史意识的转移》,载《亚洲文化》,2005 年第 29 期,第 113—127 页。

6. 《马新华人研究概述》,载《南洋商报》,2005 年 8 月 22、23、24 日;《华研 20 周年纪念特刊》,第 125—131 页。

7. 《马新南洋研究的意义和定位初探》,载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中文·人》,2006 年 4 月创刊号,第 32—37 页。

8. 《纵论战后马新南洋研究的学人(1945—1969)》,载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中文·人》,2006 年 4 月创刊号,第 41—45 页。

9. 《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载《新纪元学报》,2006

年第3期,第1—27页。

10.《马新南洋研究与中国学术渊源》,载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中文·人》,2007年4月第3期,第10—14页。

11.《张礼千、姚楠与马新南洋研究》,载郑文泉编《绝代英华——马来(西)亚英殖民时期华裔文人与学人研究》(加影:新纪元学院族群研究中心,2007),第65—78页。

12.《中外交通史中古史地名研究的方法与难题》,载《新纪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18—29页。

13.《史料、方法、理论——谈马新中文源流“华人研究”主体的建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总81期),第23—31页。

14.《许云樵的历史文献学》,载《新纪元学报》,2008年第4期,第3—15页。

15.《南洋研究时期的研究视野——一个现今丢失的环节》,载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中文·人》,2008年4月第5期,第16—19页。

16.《〈星洲日报·文化〉副刊(1984.04.07—1988.10.29)所刊登有关南洋研究之文章资料一览表》,载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中文·人》,2008年4月第5期,第64—73页。

17.《中英学术的互动交流》,载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中文·人》编者的话,2008年12月第6期,第3页。

18.《〈星洲周刊〉1951年4月19日至1957年7月25日有关南洋研究文章目录索引》,载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中文·人》,2008年12月第6期,第78—85页。

19.《史话、散记和丛谈——试论马新民间学人及其著述传统》,载《亚洲文化》,2009年第33期,第94—107页。

全书共四章,外加一个附录。前三章将近八十年来马新的史学发展分滥觞、开创、高峰和华人研究等四个时期进行论述,着重于史的铺陈。第四章则以涉及的学者为论述对象,侧重于南洋研究时期的学

者,除简介这辈学人的生平和学术事迹,也点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和成就,以及所扮演的角色。由于研究的需要,笔者这几年也着手进行一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这些相关的整理有部分已经发表,但不拟以附录的方式附于书后,以免过于累赘,希望不久将来能结集成册。

本书涉及的两个主要概念,即“南洋研究”和“华人研究”,这里先行作个简单定义,以利阅读。“南洋研究”是指从 1930 年代开始,主要由一批中国南来的学人和报人在马新推动和建立的一种史学研究风气或传统,也即是今人所谓的东南亚研究。在研究方向上以整个南洋为关怀重点,不仅仅专注于华侨的研究。研究课题则细大不捐,包罗万象,大至国别区域,小至虫草鸟兽之名物考证皆在研究之列。至于“华人研究”,其实就是海外华人研究的简称,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大陆港台以外有华人落脚活动的华人社群。由于东南亚地区是华人聚集和繁衍最盛的所在,所以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和课题。当然,论述马新学人所进行的华人研究,其涉及范围就不仅限于马新华人,同时也涵盖东南亚个别国家的华人研究,以及整体宏观的东南亚华人研究。所以马新华人研究其意涵是指由马新学人立足于本土所进行的华人研究。其研究处理的对象不仅仅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个国家内的华人族群,同时也涵盖东南亚个别国家的华人研究,以及整体宏观的东南亚华人研究。

学术史的研究,目前在马新仍然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除了许云樵有数篇文章论及,几乎难见其他相关的论述。当然学术史能进入学者研究的视野,其先决条件必得是有相当的时间长度,否则不足以构成学术史的研究。清朝三百年的学术史也要待朝代灭亡后方有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以及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便是马新东南亚学的研究,若从葡萄牙起算则有约五百年历史,由英国全面入主东南亚开始也有约两百年历史,但是位居主流的英文学界至今也还不曾产生一部学术史的专著。本书是笔者顶石臼做戏,尝试将这八十年来马新华文学